

# 论文选刊

## 漢語歷史音韻研究中的一些方法問題

麥 耘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提 要]** 本文對漢語歷史音韻研究中的幾種方法——系統參照，統計，音位分析，語音實驗——作一些評介，並提出問題，希望能促成方法上的改進。

**[關鍵字]** 研究方法 系統參照 統計 音位分析 語音實驗

漢語歷史音韻研究的方法，可以分兩個層次：一個是宏觀的方法，如文獻考據法、歷史比較法，以及現在一些先生正在提倡的歷史層次比較法等；另一層次是較為具體的操作方法。本文準備討論的都屬於後一個層次的內容。筆者無意作全面論述，只是對某幾種方法作一些評介，同時提出問題，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以便共同促成方法上的改進。下面要談的幾種方法是：1.系統參照，2.統計，3.音位分析，4.語音實驗。

## 1. 系統參照

當面對一種新材料時，以學界同人都熟悉的、或公認在語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音韻系統作為參照系，與新材料進行比較，並得出結論，這是很常用的方法。例如研究唐代某種注音材料時，以《廣韻》或《切韻》為參照系，研究元代某種押韻材料時，以《中原音韻》為參照系，等等。

這種方法最好的地方在於可以為研究對象在語音史上定出一個坐標位置。對於一些數量不多而零散、難於運用其他方法(如系聯法、統計法)的材料，系統參照法可能是唯一的研究方法。

運用這種方法最容易出毛病的地方，是研究者的思路有時會不自覺地被參照系的特性所束縛，而忽視了研究對象不同於參照系的特性。例如，在中古後期的反切和押韻中，《廣韻》流攝的“部、浮、婦、富”等字與遇攝字頻繁相通(它們同時也與流攝字相通)，我們根據今音可以判斷是流攝一部分唇音字發生了變化，並推斷有一字兩讀的過渡階段。但是，假定沒有今音可作憑依，不是很容易誤以為當時整個流攝與遇攝相通麼？流攝在中古前期是一個整體，這會造成我們的定向思維，總覺得應該把它一直看作是一個整體。

在研究中，常會碰到類似的問題。比方說，在某注音材料中，A 韻字常常作 B 韻字的切下字，研究者不難簡單地推論 A、B 兩韻合流。然而，這是部分字合流還是全韻合流？與 B 韻相通的 A 韻字跟其他 A 韻字是否也相通？有沒有一字兩讀的可能？近年看到一些研究中古注音材料的論著，幾乎都沒有從這個角度進行考察。早年黃淬伯(1931)研究慧琳音，對此就很注意，例如仙韻字跟先韻、元韻都經常混切，但他並沒有把三個韻囫圇合一塊兒，而是仙韻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跟先韻合流，一部分跟元韻合流。朱曉農(1989)研究北宋詞韻時，把元韻唇音字抽出單獨統計，也是考慮到這些字在當時的特點。

從中古音往上推上古音，也是一種系統參照法。這種方法是必需的，有時還是其他方法所無法替代的，但也存在上面所說的問題。宋、明學者以《廣韻》為參照系，

看見《廣韻》甲韻字在《詩經》裡與乙韻字相押，而乙韻也有字與丙韻字相押，就簡單地把三韻合併為上古的一部。到顧炎武提倡“離析唐韻”，做法便有所不同：若甲韻與乙韻的一部分字相押，乙韻的另一部分字與丙韻相押，而甲、丙兩韻的關係並不密切，就可以把它們分為兩部，乙韻的兩部分字各居一部，而不必把乙韻作一個整體來處理。這實際上是明確認識到《廣韻》的系統性與上古韻部的系統性的差異。這一做法在今天被視為當然，在當時卻是難能可貴的大進步。

從《詩經》韻部出發去討論更早時代的語音，也有這類問題。郭錫良(1988)用甲骨文研究殷代音系，把甲骨文的材料擺進《詩經》韻部裡，分析其等第開合，然後直接得出結論。這無異於在研究之前就設定一個前提：殷代的韻部系統跟《詩經》的韻部系統是一致的(可能有異的只是等第開合)。但這本來正是需要加以考究的。其實，甲骨文材料與根據《詩經》押韻材料歸納出來的韻部系統互不吻合之處有不少，例如東部的“離”字和侵(冬)部的“宮”字在甲骨文中的關係，于省吾(1962)早就討論過。研究者要麼對有關的韻部在殷代音系中的地位重新加以考慮，要麼調整有關的字的歸屬。再如“侮”字在《詩經》押入侯部，而分析甲骨文的諧聲系統就只能按其所諧“每”聲歸在之部(除非有證據證明可以反過來把“每”聲字都歸到侯部)。又如“媠”从“棗”(“葉”初文)聲，應歸葉部而非月部(聯繫到金文“棗”从“世”聲、且假為“世”等情況，可知《詩經》韻系的月部中的“世”聲字、“棗”聲字在更早期均當歸入葉部)。研究古文字的音韻系統固然要拿《詩經》韻部系統作為參照系，然而，要想讓研究緊扣古文字材料本身的系統特點，像“離析唐韻”那樣“離析《詩經》韻系”是必要的。余迺永(1985)在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音時就比較注意這一點。

上古聲母研究也有同樣的問題。從中古聲母系統直接推導上古聲母系統，常會使結論與材料扞格。例如中古章組，若按錢大昕之說整個地歸到上古舌音，就會使“收”从見母“𠂔”得聲、“聲”與溪母“磬”同聲符(其實二者還是同源詞)這一類現象得不到解釋；與此平行，如果將日母按章太炎說都歸泥母，也會出現“熱”以疑母“執”(“藝”初文)為聲符、“兒”作疑母“倪”的聲符這樣的異例。顯然，中古章組

和日母在上古應離析為舌音和牙音兩支。這提醒我們，應認識到上古聲母具有與中古聲母不同的系統性，研究上古聲母也要對中古聲母進行離析。

要避免上述毛病，就要非常注意參照系與研究對象之間可能存在不同的系統特性。至少，有意識地嘗試“離析參照系”，看來是運用系統參照法時一道不能越過的程序。

## 2. 統計

傳統的研究在擺材料時，是用“例舉法”，列一些例子便可作為證明。不過，“例不十，法不立”的說法已經表現出一點數量觀念了——只是還不能算是統計觀念。

隨着語言研究向科學化方向的邁進，統計法的運用漸漸成為趨勢。事實上，有些課題不用統計就無法釐清材料。例如《切韻》的重紐兩類之別，固然常常跟反切下字有關，但有時候反切下字相同，要靠反切上字區分。如果單純系聯反切下字，就會把兩類串在一起，只有統計數字才能說明反切下字的分組趨向。

最簡易的統計是算術統計——點數和算簡單比例。與非統計方法相比，算術統計也時見好處。例如《切韻》的泥、娘二母，系聯反切上字能系聯在一塊，而邵榮芬(1982)和麥耘(1991)只用點數，就證明它們是可以分開的。

但算術統計的缺陷很明顯，主要是有時缺乏判斷的標準。周祖庠(2001)研究《篆隸萬象名義》，說兩韻或兩母混切在 5% 以下的算分開，10% 以上算混合，在兩者之間的另作具體分析。這些百分比似乎只是憑感覺定出來的，至於對 5% 到 10% 之間的處置就更沒標準可言。對算術統計的缺陷，朱曉農(1989)有中肯的討論。

建立在概率論基礎上的統計是數理統計。數理統計可以分為古典概率統計和現代數理統計。最早運用古典概率統計方法於漢語歷史音韻研究的，是陸志韋(1939)討論《廣韻》聲類。他在研究上古音時運用的一個幾遇數公式(見陸志韋 1947 第十三章)到後來比較有影響，管燮初(1982)研究上古音、麥耘(1992)研究《切韻》的重紐、李玉(1994)研究秦漢簡帛材料的音韻現象、鄭林嘯(2002)研究《篆隸萬象名義》的聲母系統，都用了這個公式。黎新第(1990)證明古清入聲字在元曲中用同上聲字、麥耘(2002a)證明朱

韻音有 *i* 韻母，也都用到古典概率統計的方法。

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現代數理統計方法也進入了漢語歷史音韻研究的領域。朱曉農(1982，後經修改正式出版，即朱曉農 1989)用一組公式，包括 T 分佈假設檢驗，來研究北宋中原詞人的押韻。白一平 (Baxter 1985)研究上古幽部內部的押韻情況，用的是  $\chi^2$  分佈假設檢驗。後來麥耘為在學界推廣數理統計方法，策劃把朱氏和白氏的公式編成了電腦軟件，並用於分析隋代的押韻材料(麥耘 1999 和 2002b)。金恩柱(1998)、劉修海(2001)和張建坤(2002)用朱氏的公式分別對唐代墓志銘、元代散曲和清代子弟書的用韻進行了研究。白一平(Baxter 1992)又在對《詩經》押韻的研究中運用了兩點分佈等統計方法。李書嫻(2003)提出用聚類法研究古代押韻材料。陸致極(1992)則用相關系數分析法來研究《中原音韻》的聲母系統與現代各方言聲母系統的關係，以幫助確定中古莊、章、知組聲母在《中原音韻》是一套還是兩套。

數理統計的判斷標準有數學上的理據，根據計算結果所下的判斷，其基礎之堅實，與憑直覺或經驗所作的判斷相比，完全不是一個層次。更引人注意的是，數理統計可以在相當細膩的地方展現其作用。譬如押韻統計，按傳統的方法歸納韻腳只能分出韻部(韻轍)，一部之內是否還能細分，常常是看不出的，而數理統計就能。這實際上是對“同一韻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種主要元音”的觀點的嚴重挑戰，因為既然一部中還能再分，人們自然會想到是主要元音可能有別。當然，對“一部一元音”說應該怎樣看，還可以討論，筆者在這裡要說的是，數理統計在這裡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有數學理據為後盾的思路。

但是，並非用了統計方法就一定能得到可靠的研究結論，因為還有一些因素需要考慮：

(1) 統計數據是如何獲得的？

舉押韻材料為例。朱曉農和白一平的統計單位“韻次/韻對”，是指相鄰韻腳的相押關係(即把 3 個以上韻腳的押韻過程視為一種“馬爾可夫過程”)。這比以前拿“韻段”作統計單位當然要好得遠了。但麥耘 (2002b)提出：把同韻段而不相鄰的韻腳之間

的關係完全排除在外是否合適？朱曉農在給筆者的私人電郵中設想，可以把一個韻段中的所有韻腳視為一個組合，每一個韻腳之間都算一個韻次。按照只考慮相鄰韻腳的點算法，一個包含  $N$  個韻腳的韻段有  $N-1$  韻次，而按照“組合”點算法，就有  $(N-1)!$  韻次。朱曉農說：這樣做“好處顯而易見，首先是加大了統計量，這對我們的統計來說求之不得。其次把韻腳們看成了一個整體，這也應該是詩歌的美學要求。”<sup>(1)</sup>用不同的點算法獲得的數據進行計算，其結果有沒有差距？如果有，應當如何看待？這還有待經過實際操作之後才能有話可說。筆者直觀地想到：這樣就是把相鄰的與不相鄰的韻腳之間的關係同等看待。有沒有必要、以及能不能作不同看待呢？諸如此類，都屬於統計學上的“取樣問題”，是很基本的問題，有必要深入思考。

數據的加權也需要考慮。陸致極(1992)利用的是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的漢語方言字音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又是根據的北大中文系語言教研室 1989)。可是每個字的信息量是不一樣的，同一個字在不同方言中的信息量也不一樣。理想的做法是按不同情況作加權處理。不過，由於影響因素很複雜，如何處理才更合適，要作專門的研究。押韻統計其實也有相似的問題。無論如何，隨着統計方法日益廣泛使用，加權問題終歸是繞不開的。

## (2) 具體的算法是否適用於所研究的問題？

統計學的原理是一樣的，算法基本上是現成的。但不同的問題，可能要選用不同的算法；有時候不同的算法都可以用，但計算結果可能會有差異。例如用  $T$  檢驗跟用  $\chi^2$  檢驗來算押韻問題，結果就或有不同(見麥耘 2002b)。其實，朱曉農和白一平在理論預期頻數的算法上就已經不完全一樣了。

同一算法用於不同問題時，具體用起來可能又會不同。例如陸志韋(1947)在運用他的公式研究上古音時，算出的實際相逢數對幾遇數的倍數，僅是作關係疏密判斷時的相對依據；而鄭林嘯(2002)用這個公式研究中古聲母，則拿這倍數作音類分合的標準，以 2 倍作為臨界值。她的做法是否需要再加證明？隨着將來越來越多的統計算法被用

<sup>(1)</sup> 近日朱曉農又在給筆者的電郵中談起，以為似應按有無嚴格的格律兩種情況分別對待。

到的時候，這一類問題也會越來越多。

### (3) 對統計結果能作經驗性的驗證嗎？

數理統計有數學理據的基礎，可是統計學也常常強調經驗性的驗證。筆者曾設想用現代押韻材料對幾種押韻統計方法進行驗證。例如現代普通話中 *an* 和 *jɛn* 是押韻的。可以用上述方法來看看，它們之間有沒有界劃？如果有，說明這些方法可以精細到分出音值的不同(能區別 *a* 韻腹跟 *ɛ* 韻腹)；如果看不出，說明頂多只可以區分音位。筆者曾指導學生用北京、河北、東北現代民歌的押韻材料做過一個小規模的驗證，結果發現 *i* 跟 *ĩ* [ɿ/ʅ] 分得開，而 *i* 跟 *y* 卻不能分，用朱氏或白氏算法結果都一樣。這到底是說明這些算法還不夠好呢，還是說明 *i* 和 *y* 的韻腹其實是同一音位、區別只在於介音，如同薛鳳生(1986)所說？這個驗證規模太小，還不可靠，希望有人來做大規模的。

### (4) 如何從統計結果還原出它的物理意義？

數字是抽象的，它代表的物理意義則是具體的。對於歷史音韻學者所研究的問題來說，這個物理意義就是語音史上的事實。能不能正確地把數字中所蘊藏的信息還原為事實，是個不易把握的問題(至於我們掌握的數字到底涵括了多少信息，則是上面說到的第(1)個問題)。有時候會碰到互相矛盾的數字，令人不知所從，如朱曉農(1989:66)就發現北宋詞韻中文韻牙喉音及欣韻的地位很難定。有時候問題出在計算結果與研究者的知識系統不符，如麥耘(2002b)用白氏算法得到沒、月兩韻相混的結果，卻不敢下判斷，一是覺得難以從語音史角度解釋，二是這跟相對的陽聲韻魂、元韻分立不相平行。此外，在不同的情況下、對不同的問題(譬如合流還是分化)該定多大的顯著水平( $\alpha$  值)、接近臨界值的數字如何作附加判斷，等等，都需要有一些規範。

總之，發展統計方法、尤其是數理統計在歷史音韻研究中的運用，大有可為，方法上則須更進一步。

## 3. 音位分析

高本漢是不講音位的。他構擬的上古、中古漢語音系都有多達十五、六個韻腹元音，介音系統也相當繁複(Karlgren 1915-1926,1954)。董同龢(1948)的上古元音更多達

20 個。

王力的上古元音系統是 5 個(王 1957)或 6 個(王 1985)。他雖沒明確說，但實際上是音位化的構擬。他早年對《切韻》的擬音(王 1957)仍是類似高本漢那樣的非音位化體系，結果造成簡明與龐雜之間不能銜合的銜接。他在晚年(王 1985)對中古的分韻作了簡併，這種情況就消失了。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較早在上古音構擬中明確提出音位觀念，他擬了 5 個元音，各分長短。周法高(1969)只用 3 個元音，而韻尾系統很繁富。李方桂(1971)和張琨(Chang 1972)構擬上古音都只用了有數的幾個元音(李氏也有與王力 1957 相同的問題)。鄭張尚芳(1982)用 6 個元音而各分長短、麥耘(1995a)用 7 個元音，都是音位構擬。中古音方面，馬丁(Martin 1953)作了非常音位化的構擬。不過他並未能區分《切韻》所有的韻母，也未區分重紐。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和周法高(1968)分別構擬了 11 個元音和 10 個元音，前者由介音區別重紐，而後者用元音區別。鄭張尚芳(1987)的《切韻》構擬用介音區別重紐，尤有特色的是二等韻有獨特的介音，韻腹元音 12 個(實可合併為 8 個)。麥耘(1992,1995d)的中古介音系統近似於鄭張尚芳，元音則是 7 個。余迺永(1993)也提出 7 元音的構擬。黃笑山(2002)全面討論了《切韻》元音的音位化構擬問題，指出如不考慮二等韻介音，可以 9 個元音區分《切韻》各韻；若引入二等韻介音之說，則 7 元音即可；如能妥善處理庚三與陽韻的對立，元音數目還可以減少至 6 個。中古聲母方面，陸志韋(1939)分 51 類，是不考慮音位的。凡是作音位合併的各家，基本上都是三十多個。唯麥耘(1994b)把一些聲母的音色看作介音帶來的羨餘成分，而以介音區別一部分聲母(主要是端、知組和精、莊組)，遂將《切韻》聲母歸併為 28 個。麥耘的系統是目前《切韻》構擬中韻腹元音數目最少、聲母數目也最少的系統，而介音就相應地比較複雜，承擔了很重的區別功能。(1)

薛鳳生一向提倡音位分析。他以 3 個元音為現代北京音建構音位系統，上推《中

<sup>(1)</sup>在本文完稿之後，筆者讀到葛毅卿的遺著(葛 2003)，始知他在三十多年前已為《切韻》音系構擬了 28 聲母，處理方法亦與麥耘相近。元音 6 個，而有長短之別和前響複合元音作韻腹的情況，實則為 14 個。

原音韻》和等韻音系是 4 個元音,《切韻》7 個元音(Hsueh 1957, 薛 1985,1986,1996)。其等韻和《切韻》音系的介音系統簡單而韻尾系統較複雜。

下面試着把筆者在這方面的幾點感受拿出來討論一下。

(1) 在音值構擬的基礎上作音位分析, 通過音位分析檢驗音值構擬。

音位分析須以音值構擬為基礎, 這是一條基本原則。這正若要對現代某個音系作音位分析, 先得把音值調查清楚。但有些音位化構擬對此未充分考慮。如馬丁擬《切韻》江韻為  $\epsilon ng$ 、清韻為  $i \epsilon ng$ 、而庚韻為  $ang, iang$  時, 就未先考察清楚這 3 韻之間的遠近關係。薛鳳生(1996)擬《切韻》支韻為  $/yey, ywey/$ 、齊韻為  $/ey, wey/$ , 而微韻為  $/yoy, ywoy/$ 、哈灰韻為  $/oy, woy/$ 。但在隋代詩文中, 支與齊從不通押, 微與哈灰幾乎沒有通押的例子(見麥耘 1999), 僅以音位上止、蟹兩攝“隱然有互補之勢”並不構成如此構擬的堅強理由。

出現這一類問題, 有遷就既定的體系或觀念的因素。李方桂(1971:27)把“上古同一韻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種主要元音”作為“一個嚴格的假設”, 說:“我們必須先看是否有一個簡單的元音系統可以解釋押韻現象, 是否可以用些簡單的演變的條例把中古的韻母系統解釋出來。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不必再假設什麼長短、松緊的區別了。”他的假設一方面基於“《詩經》的韻是天籟”(李 1971:28)的觀念, 但另一方面也顯然受音位分析中的求簡原則的影響。筆者以為, 這種未進行音值構擬就先作出“嚴格的假設”的做法是大可商榷的。

另一方面, 音位分析也並非僅僅是拿音值構擬歸納為音位而已, 因為通過音位分析還可以看到原來構擬的音值是否合適, 以及有沒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例如有一派學者把《中原音韻》中的中古照、知組字分屬兩套聲母, 一套跟  $i$  相拼, 一套則否。甯繼福(忌浮)最初也是這樣主張(忌浮 1964), 但他在作音位歸納以後, 發現還是用一套音標來構擬更為合適, 而把兩套不同讀音視為音位變體(甯繼福 1985)。這就不能不令人反思, 分兩套的構擬到底實際音值區別何在。還可以舉個例子: 董同龢(1944)為了解釋上古音當中曉母與明母的關係, 構擬了雙脣清鼻音聲母  $m$ 。李方桂(1971)把這個聲

母寫作 hm，又沿着音位系統對稱性的思路，構擬出另兩個部位的清鼻音聲母 hng 和 hn，梳理了鼻音聲母字與其他聲母(已不僅是曉母)字的通轉渠道，從而發現了一條前人未能注意到的上古聲母向中古發展的路徑。雅洪托夫(Yakhotov 1960)則從另一個角度，構擬出一套 sm, sng, sn, sl 複輔音聲母來。

(2) 構擬要考慮音位系統的整齊性。

音位是成系統的，古今都不應該例外。任何系統內各個成分都一定具有相當整齊的結構關係，構擬古代語音系統對此必須充分注意。一般來說，一種音位聚合越是抽象、覆蓋面越廣，就會越整齊和對稱。例如現代漢語普通話的介音系統就是  $2 \times 2 = 4$  的格局(儘管四呼在韻母系統中的具體配置不那麼整齊)：

	非圓脣	圓 脣
非前部	開口呼	合口呼
前 部	齊齒呼	撮口呼

有關中古聲母的著名的“舌齒音比例式”(Karlgren 1915-1926:32)在細節上有不整齊之處(齒音聲母比舌音聲母多)，但在語音特征上(發音部位與塞音/塞擦音的比對)非常整齊。下面把這個比例式加上介音展開，來談談上古舌齒音聲母的構擬問題。把王力(1985)的上古舌齒音構擬加上開口介音，是這樣子：

舌	音	齒	音
t- 端一		ts- 精一	
te- 知二			tʃe- 莊二
tʃ- 知三	tʃ- 章三	tsʃ-精三	tʃʃ- 莊三
ti- 端四		tsi- 精四	

對於舌音，他先根據“古無舌上音說”把中古的端、知組合併，再根據“古人多舌音說”將章組也歸為舌音。但章組與知三組位置上衝突，只好擬為相近的音。齒音方面，精、莊組的關係本來跟端、知組的關係平行，可是在三等韻裡位置也衝突，所以對莊組也只能另擬(王 1985:20-21)。對於舌音和齒音兩處位置衝突，他各用一種辦法

來解決。這就造成在舌音與齒音的音位關係上，知三組單獨與精三組相對，而知二組與莊二組互錯，格局不對稱。

李方桂(1971)的擬法是(他為四等韻擬的 i 屬韻腹元音而不是介音，這裡為進行比較，且算作介音)：

舌	音	齒	音
t-	端一	ts-	精一
tr-	知二	tsr-	莊二
tj-	知三	tsrj-	莊三
tj-	章三	tsj-	精三
ti-	端四	tsi-	精四

他解決位置衝突的辦法是為三等韻擬兩種介音。要強調的是，他把舌音與齒音相對應的位置上的衝突用統一的手段來解決。且不說這個構擬對端組與章組、精組與莊組的關係能說明得更好，光看音位結構，它就比較整齊(舌音知二、三組與齒音莊二、三組一一對稱)。古音構擬的實質性任務，本來就主要地不在於認定具體音值，而在於通過對音值的構擬來表現音位之間的關係。誠然，三等韻是否可以擬出兩種介音，會有不同意見，但即使只給三等韻擬一種介音，從音位系統整齊性的角度考慮，也可以有別的擬法，譬如把王力的二、三等韻改為：

	te-	知二		tje	莊二
tj-	章三	tj-	知三	tsj-	精三
				tji-	莊三

或者改為：

te-	知二		tse-	莊二	
tj-	知三	tj-	章三	tsj-	精三
				tji-	莊三

都能達到整齊。不過第一種改法的問題是不能解釋為什麼章組脫離端組比知組要早(李方桂的構擬就能解釋得很好)；第二種，後代莊二組變了，精三組反而不變，說不清。

構擬要能對語音發展作出解釋。所以這些構擬總不如李方桂(1)。

鄭張尚芳(1982)指出，在李方桂的構擬中，元音跟韻尾的配合不平衡。這是很中肯的批評。《詩經》韻系中 -ŋ/k 尾韻部特多，-n/t 尾韻部少，-m/p 尾韻部更少，如堅持一部一元音的假設，畸重畸輕是必然的。王力晚年(1985)把他早年所擬的上古 -u/uk 韻尾取消，使這種情況更加突出。

鄭張尚芳主張上古一部可以不止一個元音，在他的構擬中(鄭張 1987)，每一個元音幾乎都與每一種韻尾配合，非常整齊。不過，筆者以為儘量追求整齊也未必是最合適的。事實上，語言系統也不總是非常整齊的，我們見到的活語言現象倒經常是在整齊中有不整齊。所構擬的音系框架當整齊還是當不整齊，最終還要看實際材料。例如《詩經》幽、覺部沒有相應的陽聲 -ŋ 尾韻，就不必強配“終部”(冬部)。材料顯示這一部的字在當時還是 -m 尾，當歸侵部。至如陳振寰(1986)進一步設想成立一個江部，與宵、藥部配齊，這也要得到材料的支持才行。

如何看待音位系統的整齊與不整齊，並將此觀念運用於古音構擬中，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 (3) 重視介音在音系中的獨特地位。

介音是漢語語音中很獨特的一種音位，對古音中的介音的構擬可以影響整個音位系統的面貌。例如，諸家為二等韻的上古音構擬某種介音(如王力的 e、李方桂的 r)就是上古元音系統簡單化的重要原因。

李方桂(1971)的上古介音有 4 類(合口不算)，其系統關係可以用如下比例式表示：

$$\emptyset : r = j : rj$$

$$\emptyset : j = r : rj$$

麥耘(1992,1995b,1995c)認為，這 4 類介音的格局(配上合口是 8 類)一直保持到《切韻》和等韻時代，並殘存在《蒙古字韻》中，不過具體所轄的字不完全一樣。麥耘簡化《切韻》元音和聲母，立足點就是對介音的構擬。潘悟雲(2000:89-90)的《切韻》介

<sup>(1)</sup> 李氏的兩種三等韻介音不僅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設，還有其他作用，這裡不談。

音系統也是此格局，不過把上面的 r 改為u，j 寫作 i。

薛鳳生所構擬的介音系統，從現代北京話上溯至《切韻》都是“開齊合撮”4類。他認為介音除用半元音 /y/ (= [j]) 和 /w/ (以及它們相配合而成的 /yw/) 來區分“開合洪細”之外，難有更多的功能(薛 1996)。在看待介音的功能大小這個問題上，他跟麥耘是兩個極端。

馬丁和薛鳳生有一點惹人注目地相同：把前後圓展不同的高元音歸納為同一個音位(馬丁寫作 /*i*/，薛鳳生寫作 /*i*/)，而把它們的區別歸結為介音的不同。如薛鳳生的 /*yi*/ = [i]，而 /*wi*/ = [u]。

這些做法和觀點的優劣，需要學界評判。不管如何評判，都直接涉及介音構擬在語音史研究中的位置。

#### 4. 語音實驗

語音實驗本來是對活語音進行研究的手段。它之所以能夠用來研究已經不存在的古代語音，是由於我們認定古代人在發音生理上與現代人是一致的(這有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支持)，而與聲音有關的各種物理現象的性質當然更不受時代的限制。

麥耘(1996)曾嘗試從音高曲拱影響聲母發音方法的角度解釋古全濁音在今音中分別變送氣與不送氣清音的原因，認為升調使送氣成分易於保持。朱曉農(2002)運用人類發音的空氣動力學原理，證明在發濁塞音時，發音部位越靠後，就越難發，因此 g 比 b、d 容易消失，而軟化的 gj 由於發音部位前移，故而又比一般的 g 易於保存。由此可以解釋中古漢語群母只剩三等韻字、在其他諸等韻中缺失的現象。他還證明 z 在所有濁擦音中是最難發的，這就為上古漢語沒有邪母以及中古有的音系中從、邪母相混的現象提供了一種發音學上的詮釋。最近承朱曉農下示，筆者讀了他的兩篇未發表的論文稿，也是運用語音實驗的方法來討論漢語語音史上的問題。其中一篇談 bj 與 d 在聲學圖譜中的相似性，以解釋漢越語中重紐四等唇音字讀舌音的現象，並討論中古漢語重紐四等介音的性質。這篇文章的意義已經超出它研究的問題本身，而更涉及了重紐現象的性質，乃至於與《切韻》音系的性質問題有關。另一篇是討論漢語語音史、包括

方音史上的元音高化現象，以及與之相關的元音鏈移、高元音裂化等問題。他試圖用一種統一的音變規律來解釋語音史上元音的各種變化。

從描寫走向解釋，這是一切科學研究的基本趨勢，也是語言研究的基本趨勢。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來討論語音史上的問題，正是試圖對語音的演變、發展作出合乎發音生理規則和物理規則的解釋。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少，而可以做的事情却非常多。

要運用這種方法，我們主要的薄弱點，是對許多發音機理還不甚瞭解，或者甚不瞭解。舉個例子說，“捲舌音”在漢語歷史上的發生和發展，是被經常討論和爭論的問題。但是，“捲舌音”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音？其音色是否如廖榮蓉(1994)所說，由“舌下腔”所造成？發這種音時舌體如何運動？它能不能與 i 相拼？等等，至今沒有定論，而這個問題與莊、知、章組聲母自上古直至《中原音韻》各個階段裡當如何構擬直接相關。又如上古的複輔音聲母到中古變為單輔音，有多種變化，如何對此給出音理上的解釋？潘悟雲(2000:274)根據語音響度和強度的序列，推測哪個成分在變化中容易失去、哪個成分應當保留，從而推導出一系列的構擬。他的做法非常值得重視，而這同時也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有必要從實驗語音學的角度對有關的理論作出證明。可以預料，證明的結果不但能檢驗現有的研究成果，還一定能為未來的研究打開新的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語音演變還有生理和物理之外的因素，並非一切都必須或可以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來解釋的。例如，軟顎輔音 k 等在 i, y 之前會受同化而前移為硬顎音，是近代後期官話方言中 t 組聲母出現的動因，這大家都承認。但此前從上古到近代前期漫長的歲月裡，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現代南方許多方言中，軟顎輔音至今穩定地與 i, y 相拼。對此，上述動因就套不上。如何把語音實驗方法與導致語音發展其他方面(譬如語言自身的系統調整、人的心理認知、語言和方言接觸、社會其他因素影響等方面)的考量結合起來，或者說怎樣擺正關係，仍是個需要探索的課題。

實事求是地說，從實驗語音學的角度去解釋歷史上的音變規律和過程，在目前並沒有多大的把握。有些解釋會顯得牽強；有些現在看來頗有道理的說法，到以後人們



- 廖榮蓉 1994 國外的漢語語音研究, 石鋒[主編]《海外中國語言學研究》, 語文出版社, 北京
- 劉修海 2001 元散曲用韻研究, 中山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論文, 廣州
- 陸致極 1992 《漢語方言數量研究探索》, 語文出版社, 北京
- 陸志韋 1939 證《廣韻》五十一聲類, 《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二)》, 中華書局 1999, 北京
- 1947 《古音說略》, 《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 中華書局 1985, 北京
- 麥 耘 1992 論重紐及《切韻》的介音系統, 《語言研究》總 23, 武漢
- 1994a 關於章組聲母翹舌化的動因問題, 《古漢語研究》總 22, 長沙
- 1994b 《切韻》二十八聲母說, 《語言研究》總 27, 武漢
- 1995a 《詩經》韻系, 麥耘《音韻與方言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 1995b 韻圖的介音系統及重紐在《切韻》後的演變, 同上
- 1995c 《蒙古字韻》中的重紐及其他, 同上
- 1995d 《切韻》元音系統試擬, 同上
- 1998 “濁音清化”分化的語音條件試釋, 《語言研究》增刊, 武漢
- 1999 隋代韻文材料的數理分析, 《語言研究》總 37, 武漢
- 2002a 漢語語音史上的  $\ddot{i}$  韻母, 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二屆學術討論會論文, 石家莊
- 2002b 用卡方計算分析隋代押韻材料, 吉林大學《語言文字學論壇(第一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 甯繼福 1985 《中原音韻表稿》,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長春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邵榮芬 1982 《切韻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 王 力 1957 《漢語史稿》, 中華書局, 北京
- 1985 《漢語語音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 薛鳳生 1985 試論等韻學之原理與內外轉之含義，《語言研究》總 8，武漢
-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1996 試論《切韻》音系的元音音位與“重紐、重韻”等現象，《語言研究》總 30，武漢
- 余迺永 1985 《上古音系研究》，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
- 1993 再論《切韻》音——釋內外轉新說，《語言研究》總 25，武漢
- 于省吾 1962 釋 ㄨ、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 1979，北京
- 張建坤 2002 清車王府抄藏曲本子弟書用韻研究，中山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論文，廣州
- 鄭林嘯 2002 音韻學中的統計運用：《篆隸萬象名義》聲母考，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論文
- 鄭張尚芳 1984 上古音構擬小議，北京大學《語言學論叢》14，商務印書館，北京
- 1987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4
- 周法高 1954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周法高《中國語言學論文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75，臺北
- 1968 論切韻音，周法高《中國音韻學論文集》，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4，香港
- 1969 論上古音，同上
- 周祖庠 2001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第一卷·上冊）》，寧夏人民出版社，銀川
- 朱曉農 1982 證北宋豫魯地區十八轍三十四組，復旦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論文，上海（摘要載《語言學新探》，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北京）
- 1989 《北宋中原韻轍考——一項數理統計研究》，語文出版社，北京
- 2002 群母的命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二屆學術討論會論文，石家莊
- Baxter, William H. (白一平) 1985 漢語上古音的\*-u 和\*-iw 在《詩經》中的反映 [中譯本，馮蒸譯]，馮蒸《漢語音韻學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北京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 New York

Chang, Kun (張琨) 1972 古漢語韻母系統與《切韻》[中譯本, 張賢豹譯], 張琨《漢語音韻史論文集》,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1987, 武漢

Hsueh, F. S. (薛鳳生) 1957 《中原音韻音位系統》[中譯本, 魯國堯、侍建國譯],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0

Karlgren, K. B. J. (高本漢) 1915-1926 《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譯本,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 商務印書館 1940, 上海

1954 《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中譯本, 聶鴻音譯], 齊魯書社 1987, 濟南

Martin, S. E. (馬丁) 1953 The Phonemes of Ancient Chinese,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6 [本文轉引自周法高 1954]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 1962 《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譯本, 潘悟雲、徐文堪譯], 中華書局 1999, 北京

Yakhotov, S. E. (雅洪托夫) 1960 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中譯本, 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 雅洪托夫《漢語史論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 On Some Method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some method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including reference against the system, statistics, phonemic analysis and phonetic experimentation, and raises the question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improvement on the methods.

**Keywords:**methods of research; reference against the system; statistics; phonemic analysis; phonetic experimentation

# 日漢對音漢語音韻研究的 理論和方法

丁 鋒

(日本熊本學園大學)

**[提 要]** 日漢對音是指用漢字記錄的古代日語的異域譯音。日漢對音文獻現存二十多種，是日中兩國音韻學者研究古代日語和漢語音韻的寶貴資料。本文首先介紹這些資料的作者、時代、內容和容量。繼而論及日漢對音研究的理論問題，重點在於日漢對音對於探討漢語音韻史的對音學價值、可能性和優越性。最後，通過展開資料特性，以嚴謹科學為前提，討論日漢對音研究時必要的方法和步驟。

**[關鍵字]** 日漢對音 對音 古代音韻 研究方法 考證

## 一 小 引

從東漢開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日兩國交通史上，產生和流傳下來數量可觀的

日漢對音資料。這些資料分佈於各個歷史朝代，對研究當時的日語音韻和漢語音韻，特別是其音值分佈，具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在利用這些資料研究日語音韻方面，經日本學者多年不懈的深入研究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至於在漢語音韻的探究上，則起步甚晚，到近年纔漸漸引起學界的關注，纔有一些研究成果先後問世。本文企於在綜觀日漢對音資料全貌的基礎上，反芻和總結從日漢對音資料著手求證與資料相關的各時代各地區漢語音韻分佈這一研究領域的方法和理論問題，求教於諸位同好。

## 二 日漢對音資料的種類及其性質

日漢對音資料是用漢字及其所具有的發音對應性地記錄日語，包括句子、短語、單詞、漢字和假名發音的歷史語料。如“極好人 一蓋逆目搖革許多 (いかにもよかひと *ikanimoyokahito*)”、“不曉得 失藍(しらん *shiraN*)”、“馬 烏馬(うま *uma*)”、“に 尼(*ni*)”。假名在資料中或稱夷字、番字、土字、字書、字母、國字、國書、日本文，語句則稱寄語、夷語、土語、土名、方言或國語。寄語一詞來自《周禮·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南曰寄。”意為東南外域語言之譯語。因學界久來習用，本文沿襲這一稱呼。

日漢對音資料可以大分成兩類，一類是漢語與日本本島語言相關的，一類是漢語與日本琉球群島(主要分佈地區在現日本沖繩縣境內)語言相關的。從語言譜系來說，二者都是漢語(包括漢語各方言)與日語(包括日語各方言)相對應的材料。第二類因為是歷史上琉球王國與中國明清兩朝國際交往的產物，所以又通稱琉漢對音資料，以區別於第一類所謂狹義的日漢對音資料。

從上述意義劃分對音資料的話，狹義的日漢對音資料計有十四種。牠們是：(1) 唐以前史書所見對音人名地名(共有寄語 30 多條) (2) 南宋羅大經(1193-?)《鶴林玉露·日本國僧》所記日本寄語(20 多條) (3) 明洪武九年(1376)陶宗儀《書史會要·外域·日本國》所記寄語(10 條)和日語假名(47 個) (4) 明嘉靖二年(1523)薛俊《日本國考略·

寄語略》所收日本寄語(362 條) (5) 明嘉靖四十年(1561)鄭若曾《日本圖纂·寄語雜類》所收日本地名寄語(140 多條) (6)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6)之後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所收寄語(3400 多條)和假名(47 個) (7) 明萬曆二十年(1592)侯繼高《全浙兵制考》所附《日本風土記》中的寄語(日本歌謠 39 首約 1200 個寄語音節, 寄語 1000 多條, 日本山歌 12 首 400 多個寄語音節)和字書(假名 47 個) (8) 十六世紀明朝廷會同館日本館編《日本館譯語》(寄語 560 多條) (9) 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朝鮮廣記·日本譯語》(明 年代未詳) (10) 清嘉慶二十年(1815)翁廣平《吾妻鏡補》“國語解”和“國書”所收寄語(含寄語、日本地名和長崎町名三種資料共 1050 多條)和假名(94 個) (11) 清道光年間(日本江戶時代文政年間)日本人翻譯野田希一《得泰船筆語》所記假名(47 個) (12) 清光緒十年(1884)王燕《東語簡要》(1000 多條) (13) 清光緒十五年(1889)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方言”“日本文表”所收寄語(420 多條)和假名(98 個) (14)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陳天騏《東語入門》(寄語 1970 多條 假名 47 個)。

第四種《日本國考略·寄語略》作為抗倭著作中最早的寄語資料, 在明代民間備受重視, 其內容先後被蹈襲, 重編收入《日本圖纂·寄語雜類》(1561)、《籌海圖編·寄語雜類》(1562)、《登壇必究·東倭·寄語雜類》(1562)、《全浙兵制考》所附《日本風土記·寄語》(1592)、《倭情考略·倭語》(1597)、《武備志·四夷·日本考·譯語》(1621)、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朝鮮廣記·日本譯語》、龍威叢書第九集《八紘外史》(1683)等至少八種著作中, 成為流傳最廣, 影響最深的日漢寄語資料。琉漢對音資料計有十三種: (1) 《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見人名地名(收寄語 8 條) (2) 十六世紀明朝廷琉球館會同館《琉球館譯語》(595 條) (3) 明嘉靖十四年(1535)冊封使陳侃《使琉球錄》所附“夷語”(407 條)“夷字”(假名 48 個) (4) 明萬曆七年(1579)冊封使蕭崇業《使琉球錄》所附“夷語”(404 條)“夷字”(假名 48 個) (5)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冊封使夏子陽《使琉球錄》所附“夷語”(404 條)“夷字”(假名 48 個) (6) 明周鍾輯《音韻字海》所附“夷語音釋”(392 條)“夷字音釋”(假名 47 個) (7) 明張嘉和《篇海類編》所附“外夷語音之殊”(392 條) (8)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朝鮮廣記·琉球國字》(9) 清

康熙六十年(1721)冊封使徐葆光《中山傳信錄》所收“琉球語”(606 條)“字母”(假名 48 個) (10)清乾隆十七年(1752)琉球國中山王府奉乾隆帝之詔編修進呈《琉球土語》(282 條) (11) 清乾隆三十年(1764)國子監琉球官學教習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所收“土音”(402 條)“字母”(假名 48 個) (12) 清嘉慶五年(1800)冊封使李鼎元《琉球譯》(3110 條, 以所注逐一漢字音計約 5700 條) (13) 清其他冊封使錄中散見寄語(共 100 多條)。其中(5)(6)(7)三種祇是對(4)的大致蹈襲, (8)與(3)的“夷字”部分雷同, (2)與(3)、(3)與(4)也分別有傳承關係。

二十多種資料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方言多種多樣。就音韻對應大致已經究明的資料的漢語分佈看, 與吳語有關的有《書史會要·外域·日本國》、《日本國考略·寄語略》、《日本圖纂·寄語雜類》(地名)、《日本風土記》、《得泰船筆語》、《東語簡要》、《東語入門》、《中山傳信錄》和陳侃《使琉球錄》的“夷字”部分。與徽語有關的有《日本一鑑·窮河話海》, 與贛語有關的有《鶴林玉露·日本國僧》, 與閩語有關的有《吾妻鏡補》的“長崎町名”和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朝鮮廣記·日本寄語》。反映北方官話的有《日本館譯語》、《琉球館譯語》、陳侃《使琉球錄》“夷語”、蕭崇業《使琉球錄》、《琉球入學見聞錄》、《琉球譯》和《遊歷日本圖經》。音韻性質尚待究明的有唐以前史書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見對音人名地名資料、《吾妻鏡補》日本地名和寄語、《琉球土語》和清代其他冊封使錄中散見寄語。日漢對音資料對吳語音韻史和官話音韻史尤其具有研究價值。

全部二十五種資料中明代佔十二種、清代佔十種。日漢對音資料主要對研究近代漢語音韻, 特別是明清漢語音韻有重要意義。

日漢對音資料由於包含各種語言成份, 因此其研究價值不僅僅限於音韻, 對研究漢語和日語的詞彙史和語法史亦有其特殊的功用。

### 三 日漢對音資料的漢語音韻研究基礎

現存的日漢對音資料對於漢語音韻研究的可能性、操作性和有效性, 作為研究的

前提和基礎可以從理論上進行論證。

(一) 從對音學的角度來看，凡是一種語言的語音被另一種語言的語音記錄下來，只要可以雙邊釋讀，不論是什麼年代的資料、何種語種和何種文字，都可以通過語音解讀和比照研究的方式，過濾還原出被記錄方語音和記錄方語音，為研究當時的語音狀況給雙方語言提供構擬音。這種構擬音雖然不是活語言的，祇是相對精確的，但因為源於活語言，是解析活語言的結果，是物質可感的，有鮮活性的，因此對於語音研究，尤其是鞭長莫及的古代語音的研究具有無法替代的不可多得的價值。其功用主要在於為歷史音韻學提供音值素材，其應用價值除體現在音值本身對於音素和音位的認識意義之外，對音類的劃分乃至音系的建立都有可珍的參考意義。日漢對音作為漢語與日語的語音對譯成果，自然也有上述同樣的功用和價值。

(二) 在中國及漢文化與週邊和遠隔國度及其文化的相互衝突、親和、交融、吸收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孕育了大批漢語與外域語言的對音文獻和蘊含散見對音資料的文獻。這些對音資料，不論是通篇還是斷篇，還是片言隻語，都有其用於音韻研究的閃光價值。歷史上出現的與漢語相關的外域語言對音資料，有梵漢、藏漢、西夏漢、蒙漢、朝漢、日漢、越漢、比(比利時)漢、琉漢、葡漢、意(意大利)漢、泰漢、緬漢、滿漢等多種部類，在佛教東漸的中古時代和歐風浸染的近代，還產生了一些漢語與中亞各語言、漢語與歐洲各語言的對音資料。這些珍貴的文獻如同寶藏，已經引起和正在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展開發掘和研究的工作。對音實踐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兩漢，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作為研究其成果——對音資料的對音學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領域，對音的科學研究史尚不足對音實踐史的十分之一。在上述對音資料的研究方面，有的部類起步早，發展快，創獲也大，有的部類則滯後許多，有的部類甚至尚無人問津，總的來說可喜又可期。漢語對音學是漢語音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理論形成、體系形成、隊伍形成和資料發掘、深入研究上都理應有更大的作為。這一時代要求對於日漢對音研究領域來說是不能而外的。

(三) 漢語作為一種語言，與其他眾多語言不同的是用表意文字實現表記功能，因

為不直接表音，與用表音文字直接或大致直接表音的文字體系在對音資料的狀態、性質和形式上都大相徑庭。對音因為是雙向的，漢語在作為記錄方和在作為被記錄方時呈現不同的情況。作為被記錄方時，如果記錄方是表音文字(如歐洲文字)，漢語的語音勢必通過表音文字可以直觀直感;作為記錄方時，則祇能通過自身的書寫體系漢字來音記被記錄語言，不管對方是表音還是表意文字(在記錄口語語音時則不受文字種類的制約)。漢字在語音上是超方言的，特定對音資料的特定漢語語音是潛藏在漢字後面的。這種特質給漢語作為音記語，漢字作為音記符號時的對音資料的研究增加了難度，因此需要有一套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纔能確保研究成果達到最大的可信度和準確度。漢字的外語對音如果方法正確，考證翔實，其研究是可行的，成果是可期的。這一不爭的觀念，為漢外對音研究史長期成功的實踐所證實。日漢對音也屬於漢字的外語對音，其研究與其他關連部類在方法和操作上有許多共通的地方，可以多借鑒，多效仿。

(四) 漢外對音研究的成果除了取決於有效的方法和操作之外，也取決於兩種語言的性質及其語音是否類似，還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推導成果論證成果的關連文獻。在日漢對音的研究中，日語語音的性質、狀態與賦予研究的文獻條件直接決定了研究的成敗和質量。

日語是黏著語，雖然在語言系譜歸屬上尚無明確的結論，但日語與阿爾泰語系語種的關連性和相似性早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日本自古無文字。在漢字由後漢三國之際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到平安時代(八世紀到十一世紀)初期，產生了《古事記》(712)、《日本書紀》(720)和《萬葉集》(759)等日本最早的漢文經典文獻。這些文獻的問世是漢字在日本傳播數世紀的結晶，也是漢字既已被決定性地選擇作為日本國文字的里程碑。代表日語音節體系的音節表“五十音圖”和音節順口溜“いろは”產生在平安中期。日語假名是繼以漢字音直接表示日語語音的萬葉假名之後生成演化的日本文字，其平假名形體取材於漢字草書，片假名形體取材於漢字楷書的一部分。日語作為一種音節數量封閉型語言，在現代規範日語中，五十音圖假名加上長音和拗長音祇有不到

一百個音節。而音位祇有十七個，其中輔音音位十二個([k g s z t d n h b p' m r])，元音音位五個([a i u e o])。日語在語音分佈上不太廣闊，但其音節類型、輔音類型和元音類型都與漢語有很大的類似性，二者的相互覆蓋率是很高的。這一方面由於古代日語的語音系統本來就簡單，另一方面由於日語在吸收漢字音的過程中，增添的音節和演變後的語音多打上漢語語音的烙印。可以說，日語語音雖然簡單，不能廣泛覆蓋遠更複雜的整個漢語音系，但既有語音分佈與漢語語音分佈很類似，對音的對應效能很高，比起其他一些與漢語對音，卻在語音結構上不夠協調的語種音系來，可比性可謂是得天獨厚的。

現存日漢對音資料集中在日本文字使用(日本漢字和假名)定型之後的時代，所以在文獻上具有時代可比性。平安時代起一方面漢字音進入日語，佛典的訓點資料日趨增多，一方面用日語書寫的文獻大量湧現，日語的辭書也不斷問世傳播。這些語言文獻對對音研究，特別是對音研究不可缺少的寄語音義解讀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助的。尤其是日本本土十六七世紀基督教傳入，教士們編寫了一批日語研究論著和日外對照辭典，用羅馬字記錄日語，這為日語假名的發音精密研究帶來了福音，也是日漢對音研究的福音。羅馬字音記日語的外語辭書以出版於一六零三年，收詞三萬二千多條的葡萄牙語版《日葡辭書》最有代表性，其音記的假名音和語詞音為研究明清時代，特別是先於此纔數十年的明代資料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的堅實的參照系。此外，時代略晚的朝鮮諺文音記日語著述如《捷解新語》等，也有很好的參考價值。這些資料為準確把握日語假名和語詞在當時的具體發音提供了準繩，彌補了一批讀音處在歷史演變中的假名在音值判斷上旁證資料的欠缺。在琉漢對音方面，因為琉球語與日本本土日語有很大的差異，不能套用本土同時代的音韻資料。琉球語雖然沒有《日葡辭書》這麼恰到好處的參照書，但琉球有琉球王府十六七世紀收集編寫的神歌(おもろさうし)集及當時的碑文、文書和家譜資料，還有琉球王府一七一一年編的琉球第一部辭典《混效驗集》。爾後，有地區民間文藝山歌(琉歌)和戲曲(組踊)的歌詞和唱詞台詞輯本資料。最為可珍的是朝鮮申叔舟一五零一年編寫的《海東諸國記》所附“語音翻譯”中的琉

朝（諺文）對音和一八一八年英國軍官克利福德（H. J. Clifford）《克利福德詞彙》中用英語字母記錄的琉球語詞對音。以上這些論著是解決明清琉漢對音資料釋讀中的音韻問題接近完全意義上的參考文獻。

日漢對音資料在形成過程中，有發音人的問題。發音人的語音具有方言屬性，這在研究中是不能忽視的。日語跟漢語一樣，記錄方言語音的文獻不多見，文獻缺項的情形下，祇好付諸闕如了。

（五）對音是雙方的。粗略地看，用漢字記錄的外語語音資料，一旦解讀出來其語音，就可視為漢語音。但不經過音韻對應研究，不經過當時當地音韻資料的檢驗，是難以實現好的研究設想的。要明確對音中反映的漢語音韻的演變階段性和地區性，就需要有相應的音韻文獻及其研究成果來證明，越多越好。從以明清時代為主的日漢對音所反映的漢語方言分佈來看，北方方言的音韻研究成果比較豐厚。以明代為例，繼元代《中原音韻》後，有《中原雅音》、《韻略易通》、《青郊雜著》、《等韻圖經》、《元韻譜》、《交泰韻》、《韻通》、《切韻聲原》、《韻略會通》等韻書韻圖，還有《西儒耳目資》、《程氏墨苑》、《葡漢辭典》等羅馬字音記資料和多種朝漢諺解資料，其音系無疑有助於日漢對音成果的檢驗和定位。清代亦有不少類似的音韻資料及其研究。至於南方諸方言，吳語、閩語、徽語、贛語都有一些歷史音韻文獻，但研究成果尚不多見。在同時同地音韻資料缺項的情況下，一般祇好利用現代方音的資料和中古音的資料作遠程歷時比較。這種方法在與漢語各方言相關的日漢對音研究中既是常用的，有時候也可以說是唯一行之有效的。

#### 四 日漢對音資料漢語音韻研究的方法和過程

凡是一種具體的對音材料研究，其方法和操作過程應該包括生發於一般對音學研究原理和來自具體對音語言特性的特殊研究原理兩個層次，兩者又是相互作用，交織在一起的。

日本著名語言學家服部四郎有句名言，是說對音研究無論怎樣嚴密也不過分。這

意味著在對音的研究步驟中，從資料考證、對音解讀、對音歸納、對音構擬到對音驗證，都需要貫穿一種嚴謹審慎，實事求是的學風和態度。這不是主觀上想做就能輕易做到的，因為即使主觀條件具備，客觀上也會有許多障礙因素。以下試作分別敘述。

### (一) 資料考證

對音資料的考證，牽涉到版本、內容、作者、作者籍貫、年代、記音人、記音人的母語方言和生平、發音人、發音人的母語方言等諸多方面。

版本有鑄刻初重，手寫先後的問題，在對音資料上，最需要注意的是新版比起初版來在對音漢字上有許多錯字訛字。因為對音漢字是代表外語語音的，不是原作者或精通此道的專家都無法正確辨別其正誤，倘若外行照本畫葫蘆，稍不留意，就導致誤植連篇。如《琉球譯》，在海內現有兩個版本，都是手寫本，一個收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一個收藏在台灣傅斯年文庫。前者題“大興翁樹崑抄”，後者未署名。經兩相比較，發現台灣本優於北京本，北京本出現錯行補寫、錯字數以百計。台灣本是原本或接近原本的鈔本，而北京本是清朝重臣翁同龢的兒子(即翁樹崑)所書鈔本或再鈔本。可以推測，北京本大半是翁同龢與同為朝臣的作者李鼎元在交往中以何種方式獲得原本令兒子鈔寫而成的。同樣的現象在《日本館譯語》、《琉球館譯語》的不同版本和《日本國考略·寄語略》的各種遞相蹈襲本中也很突出，年代越晚錯誤越多，給人一種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覺。

對音資料的內容非常關鍵，因為其性質決定了對音的性質。在琉漢對音資料中這個問題比較突出。赴琉球的冊封使，特別是明代冊封使有一種不成文的風氣，就是在自編使錄的寄語部分往往參雜收入前代冊封使錄中的寄語。因為資料來源不一，也就不能將它作為一個對音層次來處理，必須剔除不同個性的部分。有時還有一條寄語部分改動對音字的情形，尤其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音資料也會有杜撰現象。明周鍾輯《音韻字海》所附“夷語音釋”主要沿襲明代冊封使蕭崇業《使琉球錄》的寄語部分，但與原書不同的條目無一可考，蓋屬編者為了標新立異，以示己書異於旁作而孱入的，不可不察。

作者的問題也很重要。譬如赴琉球冊封使照例有正副之分，在著作署名時，有以一人名義，也有兩人名義的。但實際上，不論何種情形都牽涉到對音寄語部分是由誰執筆的問題。如明代冊封正使陳侃(浙江鄞縣人)和副使高澄(大名府人)著有《使琉球錄》“夷語”、“夷字”部分，從兩部分的對音特點看，“夷語”多合北音，當出自北方官話區出身的高澄之手，“夷字”多雜吳音，當出自吳語區的陳侃之手。

此外，《日本風土記》的編者題為江蘇金山衛指揮使侯繼高，翌年浙江都督府李言恭和郝傑又以《日本考》的書名再次出版。其實他們都不是書的原作者。《日本風土記》五卷中具有非常大的篇幅詳細介紹日本文學(俗謠、山歌)和文藝(娛樂、琴法、棋格)，而且寄語的收詞廣泛細緻，應該出自一位對日本文學深有興趣而且有機會接觸日本文人的寧波文人之手。有些資料是後人編輯的，編者並非原作者。如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朝鮮廣記》的三種資料有三個來源，翁廣平《吾妻鏡補》所收三種寄語資料和假名分別來自四種著作，這些資料的原作者的研究是勢在必行的。

作者的籍貫關係到記音的方言性，需要考證翔實。中國相同地名很多。明代《日本一鑑》題名“新安鄭舜功編纂”，有的學者以為這個新安指的是廣東客家地域的新安，實際上，這個“新安”是屬於安徽古徽州的新安。籍貫錯了，南轅北轍，可能誤導語音研究，其結果勢必不堪設想。在作者不明的情況下，可以根據對音的音韻特徵追尋作者蹤跡。如丁鋒 2000:3 考證《吾妻鏡補》引用的《東洋客遊略》中“長崎町名”寄語的作者，其籍貫是福建，而且最有可能的是閩南廈門。又《琉球譯》不署作者名，從漢語記音具有四川方言色彩，同時比照使錄材料，得出作者即是清代四川藉冊封使李鼎元，該書原名《球雅》的研究結論。

記音人的母語情況和生平也是對音研究非常重要的參照信息。在通常情況下，作者往往同時是記音人。記音人的語音即是漢語對音，具有個人色彩和方言色彩，是漢語對音研究孜孜追求的對音音韻的原型。個人經歷對記音人的語音有很大的影響。一般來說，一生沒有離開過家鄉一帶的記音人，其母語方言在對音中必然有深切的反映。如《書史會要》的作者陶宗儀、身為寧波世裔的《日本國考略》作者薛俊、《日本圖纂》

的作者鄭若曾等都一生主要生活在江浙一帶，因此其音記的母語方言特徵很強，吳語的音韻研究價值很高。仕宦經歷使記音人的語音狀況趨於複雜，這種複雜性又受到個人語音修養的制約。同是朝廷命官，湖南安鄉縣出身的國子監先生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的寄語對音就京音純正，幾乎沒有湘語鄉音；而蘇州出身的官僚《中山傳信錄》的作者徐葆光在北京生活了十三年後出使琉球，寫下的寄語仍是吳音滿紙。少年時代隨父至任所四川的浙江德清人傅雲龍在北京多年任職後，在赴亞美多國考察之際記錄東京語音，其漢字對音充滿川音，既不是吳音，也不是京音。身為官員的記音人的語音情況因人而異，很有意味。因此，在研究時既重視作者的母語又不受母語的侷限都是非常重要的。

發音人母語情況的考據在日漢對音條件下主要是判斷被記錄的日語方言具有何種地域色彩。日漢對音資料中留下發音人確切姓名的可說祇有數種。如《得泰船筆語》，發音人是二十七歲的浙江平湖人、得泰船船主楊啟堂。《書史會要》假名的發音人是宋代日本入貢僧圓照。《鶴林玉露》寄語的發音人是日本臨濟宗和尚。《琉球入學見聞錄》的發音人是兩位琉球留學官生。其他有的可以推測，但不能斷定。如赴琉球冊封使們的琉漢對音發音人大致均為隨行琉球人通譯，但不詳其名。有的資料可以從日語詞的特點上判斷其發音人的籍貫。如《日本風土記》的日語詞的詞尾具有日本九州方言特點，可以推測發音人是九州人氏。日語本土方言間雖然詞彙差異常見，但幸好假名的音讀差異不大，如果對發音人的地望再有所瞭解，還是會多有些參考價值的。

## (二) 對音解讀

對音解讀是指對對音資料中出現的語詞進行基於意義的語音釋讀過程。在日漢對音情形下，如“院 梭那”，“梭那”是相當漢語“院子、園子”義的日語詞“その”的語音 sono。“院子、園子”是漢語義，也是日語義，是日漢對音的中介和橋樑。因此，尋找出符合寄語意義(一般用漢語表示)的相應的日語詞，繼而發現與對音漢字(如“梭那”)接近的語音形式的工作就是解讀。

對音解讀的技術問題有幾個方面。第一，需要準確理解寄語的漢語意義。這對於

中國學者來說似乎不是很困難，但一些古代語詞因為時代久遠，需要認真考據。第二，需要正確找出音義相合的日語詞。這取決於外語水平和是否有時代和使用目的都相適的工具書和文獻，一來語音是隨時代演變的，最好時代吻合；二來意義代有興替，一些語詞既成歷史。第三，在文獻不齊全理想的情況下，對與對音時代非共時的語音有必要依據歷史音韻演變律進行置換或加以說明。這是一項必須依據有定說的學術研究成果謹慎進行的工作。同時可以採用類推法，通過資料內證達到解讀的科學性和統一性。第四，對於經過努力查找和考證，仍然不能釋讀的寄語——牠們多屬於未被各類辭書收入的死詞、冷僻詞或有錯訛的詞條，宜以闕疑，寧缺勿濫，不強為之說。

### （三） 對音歸納

對音解讀工作完成後，需要將對音歸納成系統。日漢對音的情形，有兩種歸納法。一種是依據日語假名對對音漢字進行歸納整理，這種歸納往往用於研究假名的音韻問題。另一種是依據對音字以中古《切韻》《廣韻》為中介整理歸納出假名的對應。這是日漢對音研究漢字音常用而有效的方法。

之所以借助於中古音是因為漢語音韻學和漢語方言學都視《切韻》《廣韻》音系為漢語各歷史各地域音韻的參照系，可以通過推導，從歷時和共時的交叉點上，找到一個具體對音音系的位置。日漢對音的歸納可以採取以下步驟。

1 把經解讀的日語對音按對音字斷開對應音段(一般是一個對音字對應一個日語音節，少數情形對應一個音節的一部分或兩個音節)，在漢語對音字表下逐條逐音節地記入與該對音字相對應的日語對音。

2 統計一個漢語對音字所對應的日語對音的各種類型和次數。對於有疑誤的字(對音字)音(日語對音)對應，可作出標記或另外歸類，以影響對應用例的純粹性和規律性。

3 查出對音字的中古音聲韻地位，把同類字歸在一處，將字音對應及統計情形記入，分聲類韻類分別歸納漢語對音字與日語語音(輔音 元音 或音節)的對應關係。日語音節是屬於詞的(一音節到多音節)，與漢字一音節一聲調類型不同，故一般不作字音對

應的漢語聲調與日語重音的比較。但有的寄語材料在記音時不僅力求漢字音與日語音在音段(漢語聲韻母與日語假名)上的一致,也孜孜追求超音段(漢字聲調與日語重音)的惟妙惟肖,如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寄語略》所收日本寄語。木津祐子 1999 在對該書寄語做過嚴格梳理和精密對比後,成功推導出了十六世紀寧波聲調系統的結論。

#### (四) 對音構擬

漢語的聲母韻母與日語的語音對應歸納出來後,根據日語的語音可以大致推斷出漢語聲紐(或聲組)韻類(或韻組)在語音上的性質,隨即可以在其基礎上構擬出漢語音值。在漢日對應用例比較集中,傾向比較明顯的情形下,構擬音容易確定;在對應比較微弱,如同類音的對音字少或者對音出現次數少以及對應多歧,缺乏傾向性時,構擬難以定論。構擬可以遵循以下原則。

1 構擬音屬於漢語音,雖然源自日語對音,基於日語對音,但與日語音是異質的,異系統的。因為漢語音是折衷在日語對音中的,因此構擬音既然屬於漢語,就必須符合漢語的音韻規律,符合漢語音韻的性質。但構擬音又不能離日本對音相距太遠,失去對應的本來和效應。在日漢對音中,常見的不完全(即不同)對應如日語[r]對應漢語[l]、[ϕ]對應[f]、舌葉音對應舌尖後音、鼻冠音對應前一音節的鼻韻尾、清濁輔音交叉對應漢語清濁聲母等等。系統上的對應在對音分析中佔有重要地位。

2 構擬的目的是重建一個曾經實際存在,但又消失在文獻中的音系或音系的一部分。這個音系的現代延長線多數是某一種現代方言,在記音人語音履歷比較複雜時可以是兩甚至三個不同音系。因此,利用與漢語對音相關的現代和歷史方言音韻資料的綜合參考在構擬中是不可或缺的。漢語音韻的發展演變有時代性、漸變性、不可逆性、類推性等特點,應該把構擬音系當作歷時演變中的一個共時音系去建立,去構築。

3 構擬的物質前提是日本對音,因此不能背離它,人為地構擬漢語音。由於寄語製作時多有記音不準確統一的情形,或者記錄日語時恰巧記音人的語音中沒有最合適的漢字音而祇好用發音有距離的其他對音漢字對應。這樣一些情形,除了可以利用統計傾向立證外,還需要研究兩音系的框架性關係,判斷是否有缺項現象,仔細考究,

權衡高下，實事求是。近代漢語的一些方言中缺乏完全像日語 ka、ra、ki、hi、e[ɛ]、ke、se、ne、he、ko、so、to、no、ho、ro 一類的發音，因此祇好用發音不甚相協的漢字去對音。這種情形看上去不夠整齊，但從音節分佈的角度去仔細分析，往往能得到較好的解釋。因為漢語的單元音的音節多出現在入聲裏，因此許多入聲對音字多不對應日語促音(喉塞音)音節，而對應日語中廣泛分佈的舒聲單元音假名。這時，用於對音的漢語方言中入聲是否存在，入聲尾應當怎麼看待是需要依據史實和音韻規律審慎研究的。

4 同一類或同一個對音字的不同日語對音，除去錯訛，有時反映了漢語音與日語音的不完全對應性，因此出現語音相互參差的複數的對音現象。如日語的 e 元音在用漢語對音字時往往跨 i、e 兩類，這是因為 e 在不同輔音後，其舌位聽起來略為高化，語流中元音弱化也可以導致這種情形。反過來，日語的 o、u 兩個元音有時都用漢語模韻 u 韻母字對音，這並不意味日語的 o 和 u 已經混同，而是發 o 音時若舌位高一點，聽起來就像 u 了。同類字的複數不同對音有時也反映了詞彙擴散現象，在構擬語音時應該兼顧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5 語音是不斷演變的。對音研究中往往際遇變化中的語音。如琉球語經歷了由 a、i、u、e、o 五元音向 a、i、u 三元音，e 讀入 i，o 讀入 u 的語音演變過程，其時代在琉球王國前期的十六七世紀。因為五元音的分佈開始模糊，三元音的系統開始形成，明代琉漢對音資料中的字音對應參差不齊。這種情況應該把原因歸於被對音語方面，不能理解為漢語語音具有這種混同。又琉球語在十八九世紀開始進入舌葉音輔音舌面化歷史進程，恰巧與北方漢語見系精組聲母的細音舌面化，尖團不分重合。這種情形如果不加審慎判斷，可能曲解事實，導致循環論證。在沒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時，不使用這類材料也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日漢對音的漢語語音構擬可以是聲母韻母或元音輔音，也可以是音節；利用日語全詞，也可以構擬聲調。在表述上，可以用音標表示其音系，也可以用語言歸納其音韻區別特徵。從一個外語音系中研究推導出一個漢語的音系，實在是一項既知識牽涉面

廣，又需要嚴謹思維和求實態度的工作。

### (五) 對音驗證

對音驗證本質上不是對音研究的掃尾工作。可以說從對音解讀開始，對語音真實性的檢驗就伴隨著，並且貫穿整個對音構擬過程。驗證對音的參照物，宏觀的方面是漢語一般的價值觀，微觀的方面是同時代或同地域的語言材料。像《華夷譯語》這樣多語種對音資料集，異語種同類資料的研究成果也是驗證研究結論非常重要的準繩。驗證不是抄襲模仿，或者抹殺資料和自身研究的個性。恰恰相反，對於有個性的對音層次，哪怕是蛛絲馬跡，也可能是漢語音韻值得探索的一個閃光點，不能忽視和放棄。對音驗證使我們在對音研究時不至於擅自脫離研究本體，不至於妄自陷入主觀臆想，這大概是其真正的學術意義所在。

闡述作為歷史語料的構擬音在歷史上的階段性演變和古今的演變也是一種對對音構擬的檢驗。因為構擬音系是一個歷時線上的共時切面，如果能夠有說服力地解釋一個音系或者音系中的一些音韻區別特徵的演變過程，構擬音自然可以說是經受得起檢驗的。

## 五 結 語

以上敘述了日漢對音的研究過程和遇到的種種情形。漢外語言對音在模式上就像是攝影對光，又像是遺傳學上的尋找遺傳基因，追尋漢語音就像要去成功獲得一個恰到好處的光定位，也像要去成功獲得一鏈奧妙無窮的 NDA 組合。光定位後面的景象和 NDA 組合本身是真實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日漢對音研究就是通過各種手法，去粗取精，剝繭抽絲，照准真實的過程。對音研究呼喚理論方法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更新，在學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這是能指日可待的。

## 参考文献

- 秋山謙藏 1933 《明代における支那人の日本語研究》，《國語と國文學》第十卷第一號。
- 濱田敦 1940 《國語を記載せる明代支那文獻》，《國語國文》第十卷第七號。
- 有坂秀世 1944 《國語音韻史の研究》，三省堂。
- 小川環樹 1947 《〈書史會要〉に見える“いろは”の漢字對音》，《國語國文》九月號。
- 渡邊三男 1957 《中國古文獻に見える日本語 - 鶴林玉露と書史會要について》，《駒澤大學研究紀要》第十五號。
- 大友信一 1964 《室町時代の國語音聲の研究》，至文堂。
- 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學國文學研究室 1968 《纂輯日本譯語》，內部印行。
- 日本耶穌教會編 1603 土井忠生譯 1980 《(邦譯)日葡辭書》，岩波書店。
- 高山倫明 1987 3 《〈東洋客遊略〉の音譯漢字表記について》，《文獻探究》第 19 號。
- 木津祐子 1994 《〈日本寄語〉所反映的明代吳語聲調》，《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二期。
- 1998 《〈日本風土記〉の基礎音系》，《國語國文》第 57 卷第 11 號。
- 福島邦道 1993 《日本館譯語考》，笠間書院。
- 松本丁俊 丁鋒 1997 3 《〈日本館譯語〉中日對音考釋》，駒澤大學《外國語學部研究論集》45 號。
- 1998 3 《〈日本風土記・語音〉中日對音考釋》，《外國語學部研究論集》47 號。
- 胤森弘 丁鋒 2002 《近代方言辭書第六輯：〈琉球館譯語〉〈琉球譯〉》，港の人出版。
- 丁鋒 1995 《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97 3 《〈琉球譯〉における琉球地名の對音解讀》，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琉球の方言》第 21 號。

- 1998 1 《明清使錄所記琉球語言文字》，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語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所收。
- 1998 3 《〈琉球入學見聞錄〉における寄語の對音解讀》，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琉球の方言》第 22 號。
- 1998 5 《百年前的海鹽音和東京音——〈東語入門〉的日中對音》，好文出版《中國語學《開篇》第 18 卷。
- 1998 8 《日漢對音資料及其價值》，《語言研究》增刊(中國音韻學會 1998 年年會論文集)所收
- 1998 11 《〈鶴林玉露〉所記日本寄語反映的宋代贛語音韻》，好文出版社《球雅集——漢語論稿及琉漢對音新資料》所收。
- 2000 3 《〈吾妻鏡補・長崎町名〉中的日漢對音》，白帝社《荒屋勸教授古稀記念中國語論集》所收。
- 2000 8 《〈書史會要〉所記日語假名歌對音反映的十四世紀吳語音韻》，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研討會暨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所收。
- 2001 7 《〈中山傳信錄〉琉漢對音中反映的吳方音和官話音》，台灣學生書局《文化密碼——文化解碼 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所收。

##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about Ri-Han-Duiyin on Chinese Pronunciation**

**Abstract:** Ri-Han-Duiyin is the transliteration that recorded the pronunciations of ancient Japanese word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Today, twenties of kinds Ri-Han-Duiyin documents are preserved and were researched by phonetics scholars both Japan and China to explain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s. . This article at first presents the all of the documents and introduces the authors, dynasties and contents. Then, the theory problems about the Ri-Han-Duiyin research are suggested, the points are about the value, probability and advantag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characters it discusses the indispensable methods and steps.

**Keywords:** Ri-Han-Duiyin transliteration ancient pronunciation research smethod textual criticism

# 基地建设

## 张曦书记视察本中心资料室

4月22日下午，校党委书记张曦、副书记庞学铨在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和本中心张涌泉教授的陪同下，视察了本中心资料室和学术成果陈列室。

## 第二期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结业

4月1日至4月29日，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结业，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回到杭州。

在本次研修班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教育部部长周济等十三位部级领导作了报告。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时间安排十分紧凑。最后一周，组织了赴延安、井冈山和上海浦东的参观学习活动。方一新教授赴延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参观考察，参观了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南泥湾等地，聆听了现场讲课。此外，还顺道参观了黄河壶口瀑布、黄帝陵等著名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通过三周的学习、讨论，一周的参观考察，方一新教授说收获很大。他表示，今后要把在研修班学到的东西带回去，把它们融入、贯穿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去。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要求，努力做好中心的建设工作，为繁荣发展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奉献绵薄之力。

## 学术交流

###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中华书局编审、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四月十五日下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报告题目：莫高窟藏经洞文献与敦煌历史文化。

### 方一新教授 赴台湾中正大学作学术访问

应台湾中正大学校长罗仁权教授之邀，5月11—17日，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率团赴台湾中正大学作学术访问。我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

授、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沈松勤教授、哲学系主任盛晓明教授一同访问。

本次访问，是浙江大学文学、语言、哲学等学科与中正大学中文系签订学术交流协议后的一次具体的学术交流活动。访问的前半程在嘉义，浙大教授们拜见了中正大学校长罗仁权教授、研发长胡梦鲸教授，并与文学院、中文系、哲学系等单位负责人、教师和研究生进行了座谈，参观了秀丽的中正大学校园，举办学术讲座。方一新教授为中正大学的研究生作了“汉译佛经考辨与汉语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后半程在台南、台北，浙大教授们先后访问了成功大学、台北大学、台湾大学和台湾“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等名校和学术机构，游览了风景名胜，品尝了美味佳肴。东道主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为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访问十分成功，为两校人文学科的交流开了一个好头。今后，浙大人文学院相关系所与中正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哲学系等单位还将以多种形式展开学术交流，进行合作研究。

## 苏州大学王继如先生来我中心讲学

6月2日晚，苏州大学王继如教授来我中心讲学，吸引了汉语史研究中心广大师生，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演讲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

王继如先生演讲的题目为《训诂学与数字化》。首先，王先生指出：只要汉语言文字还存在，训诂学这门学问就不会消亡。王先生从汉语的特点、古籍的阅读等角度对训诂学的作用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接着，王先生重点讲解了训诂学与数字化的关系。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目前古代典籍的数字化进程；指出了数字化有利于获取资讯、解决疑难、数据统计，对训诂学研究大有裨益；提醒我们在积极利用数字化新成果的同时，要注意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

演讲结束以后，听讲师生还就相关学术问题与王继如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 暨南大学教授邵敬敏先生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6月7日晚,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邀请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邵敬敏教授举行了一场题为“当代汉语语法研究趋势”的讲座。邵敬敏教授是国内语法学界的著名学者,他的到来吸引了众多师生。讲座上,他指出做语法研究首先要学习语法学史,并将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加以细分,着重分析了21世纪以来语法研究的三大特点,即理论上呈现多元化、理论意识强烈,语法学界基本上完成了新老交替的过程,语法学界现高举“借鉴”和“特色”两面旗帜。他还介绍了当前语法研究的三大流派——形式语法、功能语法和语义语法。还讨论了现阶段语法研究的三大亮点:语义语法的研究、方言语法的研究和历时语法比较研究,并指出历时语法研究可以与方言语法研究相结合。邵敬敏教授的讲座内容宏观又不失具体,使在座师生对当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有了一定的了解。会上听讲者还纷纷提问,就相关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邵敬敏教授热情活泼、风趣幽默的讲座风格也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

## 厦门大学教授苏新春先生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6月4日晚,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苏新春教授在我中心做了一次题为“词汇计量研究的实践与思考”的学术讲座。苏新春教授是国内著名词汇学专家,主要从事

---

汉语词汇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词汇理论、词汇计量研究、词汇与文化关系研究等。这次讲座，他主要谈了将《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语料库进行词汇计量研究的相关问题，着重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元语言研究上的价值：流传的普遍性、编者的高素质、质量与风格的稳定性、词目的多样性和释义元语言的无意识。此外，针对语料库的建设，苏教授还向大家介绍和推荐了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并做现场演示，令在座的师生大开眼界。苏教授提出的将语料库共享的倡议在广大师生中引起共鸣。

# 人才培养

## 博士生夏凤梅、王琪、杨会永、朱习文 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6月2日上午，在中心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我中心博士研究生夏凤梅、王琪、杨会永、朱习文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四位博士生的论文题目分别是：《〈老乞大〉四种版本词汇比较研究》（夏凤梅）、《上古汉语称谓研究》（王琪）、《〈佛本行集经〉词汇研究》（杨会永）、《古天文词汇研究》（朱习文）。王琪和朱习文的指导教师是黄金贵教授，夏凤梅和杨会永的指导教师是方一新教授。

本次答辩委员会聘请苏州大学中文系王继如教授担任主席，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汪少华教授，中心的俞忠鑫、黄笑山、黄金贵和方一新教授任委员。

## 博士生朱大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6月2日上午，汉语史中心举行论文答辩会。我中心博士研究生朱大星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朱大星的论文题目是《敦煌本〈老子〉研究》，指导教师为张涌泉教授。

本次论文答辩委员会由浙江工业大学孙力平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祝鸿喜教授、浙江大学古籍所束景南教授、王云路教授、张涌泉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为祝鸿喜教授。

## 博士生胡晓华、郭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6月2日上午，汉语史中心举行论文答辩会。我中心博士研究生胡晓华、郭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胡晓华的论文题目是《郭璞注释语言词汇研究》、郭颖论文题目是《诸病源候论词语研究》，她们的指导教师均为王云路教授。

本次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苏州大学王继如教授、浙江工业大学孙力平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祝鸿喜教授、浙江大学古籍所张涌泉教授、浙江大学古籍所王云路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为苏州大学王继如教授。

# 研究生动态

## 我中心2004级硕、博士研究生举行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6月2日下午,汉语史研究中心04级硕、博士研究生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中心老师、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会上,老师们对每位同学的选题、章节、参考文献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同学们深受教益。论文的选题如下:

- 1、试析王熙凤的语用策略.....陈海威
- 2、《妙法莲华经释文》研究.....陈源源
- 3、“忏悔”、“礼拜”、“赞叹”等几个佛教修行动作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程云峰
- 4、临淄方言语音研究.....褚晓明
- 5、《楚辞章句》双音词研究.....巩玲
- 6、《孟子章句》词汇研究.....李序一
- 7、古代笔记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彭喜双
- 8、衢州九华音系及其与衢城音系的声母比较.....彭燕飞
- 9、比较林语堂小说语言与刘心武小说语言看五四后现代汉语语法的变化...汪洁
- 10、品牌·文化·语用.....王娟

- 
- 11、改革开放以来港台与大陆报纸广告语比较研究····· 伍春兰
  - 12、汉泰时间词和时间结构比较研究····· 徐武林
  - 13、余姚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 袁 圆
  - 14、《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合成词结构类型统计分析·····张迎宝
  - 15、《搜神记》敦煌本词汇语法研究·····张薇薇
  - 16、切三“例外”研究·····赵 庸
  - 17、英文影片片名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周 云
  - 18、试析《战国策》的论辩成因与技巧·····戴春霞（高师班）
  - 19、网络语言与中学语文教学之研究·····龙升芳（高师班）
  - 20、上虞商业店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和研究·····任岚岚（高师班）
  - 21、魏晋南北朝人名与文化研究·····沈夏云（高师班）
  - 22、“Vo1+Vo2”结构研究·····王淑君（高师班）
  - 23、近代汉语常用双音虚词演变研究·····雷冬平（博 士）
  - 24、《说文解字》互训词研究·····李朝虹（博 士）
  - 25、《元典章》词汇研究·····阮剑豪（博 士）
  - 26、《左传》同义词研究·····唐莉莉（博 士）